

俄国



别尔嘉耶夫集

20世纪
外国文化名人
书库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别 尔 嘉 耶 夫 集

汪建钊 编选

上海远东出版社

责任编辑 刘一夫

封面设计 王月琴

授权上海远东出版社独家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
方式复制或抄袭。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别尔嘉耶夫集

ER SHI SHI JI

WAI GUO WEN HUA MING REN SHU KU

汪建钊 编选

—————

出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开本 850×1168 1/32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编 200233)

印张 14.5

发行 上海远东出版社

千字 39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插页 4

排版 上海希望电脑排印中心

版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

印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

印数 1-3000

ISBN 7-80613-768-8/C·32

定价: 22.00 元

—————

出版说明

世纪之交,人文学术的发展历程需要回顾和检审。这是前进中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需要,而国内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当代西学所获得的相当程度的积累则使这种回顾和检审成为可能。于是,我们组织学界人士翻译、编选《20 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

“文化名人”,仅是一个因俗的称法,人物之人选以学术价值为重,至于每种人物专集之选文,都旨在真实反映该人物的思想特征和学术见解的原貌,供读者面对其人其文,分析、研究、借鉴、批评。

立志固高,行有未至,我们热诚期待学界的促进。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 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 总 序

季羨林

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在永恒不断流逝的时间的长河中，到了一定的时候，应该回头看一看，看看走过的历程中自己走得是否都完全正确，正确的要坚持，不正确的要扬弃。这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古人在这方面有许许多多的教导，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前车覆，后车戒”，通常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两句话表面讲的仅仅是反面的经验，也就是教训。但是其中隐含着“前车不覆”也是“后车之鉴”的正面的经验。

所谓“一定的时候”，可能短到只指一天，而长则是无限制的，一般的是一年，十年，百年。如果制订几年计划，则在计划结束后，也必须回头看一看，算一下总帐，目的都在回顾前车之覆或不覆以决定后车如何走法。

当前，我们中国的国家和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国家和人民，都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再想得远一点，是处在一个新的“千纪末”中。这是一个非常的关键时刻。我在很多地方都讲到过，世纪或千纪都是人们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没有什么先天的必然性或必要性。试想：如果没有耶稣和耶稣教，哪里来的什么“世纪”和“千纪”。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则是：既然人们制造出来了“世纪”和“千纪”，它们就起了作用，而且正在起着作用。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世纪末和千纪末，现在都不是第一次。然而全国和全世界都承认，眼前的这个世纪末和千纪末同过去的都不一样。由于

科学技术的惊人的进步,特别是交通通讯工具方面的突飞猛进,用一些人使用的形象的说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产生“蝴蝶效应”等等的理论,决不是偶然的。已覆的前车历历可数。当前世界各国政府和一些有识之士高呼“环保”,其声震天动地。这决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也让我们这些忧天的杞人感到点安慰。然而,就我个人浅见所及,高呼“环保”而不从事实的发展中,特别是从思想的高度和哲学的高度上,来探索环境之所以必须保护,环保工作之所以是火烧眉毛的紧迫工作的根本原因,这有点舍本逐末的意味,实在为愚陋如不佞者所难以理解。

总之,我们眼前所处的世纪末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纪末。

我在本文一开头就谈到,到了一定的时候,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就应该回头看一看,看一看在过去一段行程中车行和车覆的经验和教训,以决定今后的走法。现在正是这样的的时候了。而且,我认为,应该回头看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而是整个的世界。

正在这样关系到人类前途的关键时刻,上海远东出版社不惜人力物力,编辑出版了一套“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实在是顺乎潮流,应乎人心的壮举,我想,谁也不会吝惜对此举的赞誉。出版社提出的方针,虽然重点是放在人文精神上;然而,大家都会理解,人文精神是指导人类社会前进的关键精神,它是龙头,它同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抓住人文精神这一条纲,则纲举而目张,提要而勾玄。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打算。

为什么单单举出“外国文化名人”呢?中国《诗经》上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富有哲理而又明了形象的话,千百年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广为流传,几乎家喻户晓。远东出版社之所以选外国名人,我想其故就在这里。

对于入选的这几十位“名人”中的某一些人,中国学术界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事,不足为怪,不这样才是怪事。但是,我相信,对绝大多数的入选者来说,大家都会同意的。这些名人,时代有先后,治学有专精,影响有大小,造诣有高低。

但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过去一个世纪世界人文精神的发展,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常讲,对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要一分为二。对这些“名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一定要分清他们思想中的精华与糟粕,以便决定我们的去取。这话实际上已成为老生常谈,不用我说,大家也会明白的。

但是,我们拿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分清精华与糟粕,来决定我们的去取呢?精华与糟粕,说起来明白如日月经天;但实则是泾渭并不分明,而且随时代的推移,有时候还会转化,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我个人的想法是: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以我为主”,不能喧宾夺主;以我们目前的需要为主,决不能陈义过高或过低,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者甚至幻想。那样是有害无益的。

我们目前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是一个有十二亿人口的大国,目前正在进行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件空前伟大的工作。直接的借鉴,中国没有,外国也不会有。但是,间接的借鉴,就算是“前车之覆”吧,则是能够找到的。我说的“以我为主”,就是指以我国当前的实际为主。外国名人的思想中,对这个当前的实际有用的,我们则吸收之,否则则扬弃之。这是天经地义,用不着探讨与辩论。

但是,非常遗憾——至少我这个喜爱忧天的杞人觉得遗憾——,我发现我们学术界少数人有一种不正之风,“不正”二字加起来就成为“歪”字,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歪风”,还需要再加上两个字“邪气”,才算完整。他们膜拜外国“名人”,或者并非“名人”,或者在成为名人之前已经销声匿迹的“预备名人”,拜倒在这些人的脚下,战慄觊觎。一听到中国人有什么新的理论,就笑得连鼻子都想笑歪,鄙夷之态可掬。用“崇洋媚外”这个词儿,有点刺耳,就改用一個比较文雅一点的“贾桂思想”吧。在这些人眼中,只有外国人才有资格,才有能力,有天才,才有权利来创建新理论。在国际学坛上,中国只能成为一个“无声的中国”。对于这种现象,我实在觉得悲哀而又凄凉,可叹而又吃惊。

我对眼前外国的各种学科的新理论要说知道得很多,那不

是事实,而是吹牛。要说我一点都不知道,那也不是事实,而是撒谎。我对这些新理论了解一个大概起。有些新理论,就像时装一样,“蟋蟀不知春秋”。我曾套用赵翼的两句诗:“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说明我对这些风起云涌转瞬又风吹云散的所谓理论的看法。对待这些新理论,我的态度是:我们必须学习,必须弄通,然后实事求是地予以公允的评价。拒而不学,决不应该;顶礼膜拜,大可不必。后者不应该是一个学人,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学人应有的态度。眼前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彻底扬弃“贾桂思想”,还我一个堂堂正正身。

现在,这一套“书库”已经整整齐齐地摆在我们眼前了。外国的原作者都可以算是“名人”。书中包含着他们的智慧,当然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经验与教训共处。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这一套书呢?我个人认为,我在上面刺刺不休地讲的那一些话,就是我们对待这一个书库的准则。首先,书中必有“前车之鉴”,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识别和利用。其次,这一些书都是“他山之石”,我们用它来“攻”我们的“玉”。第三,“以我为主”,以我们当前的需要为主,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我们要按照我们当前的需要,来细致鉴别书中的精华与糟粕,以决定吸收或者扬弃,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一点是含糊不得的。如果某一些富于“贾桂思想”的人士,在膜拜当今外国那一批风云变幻,乍起又落的“名人”、“准名人”或“候补名人”之余,又来膜拜这一批已经成为“名人”的大菩萨,则我期期以为不可。是为序。

1997年8月12日,北京

林贤治

此际,我们即将到达 20 世纪的入海口。

整个当代科学,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以及人们

的联系方式、生活方式、斗争方式等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政治,影响更为直接。与此同时,科学也以其内在的动力,给予社会以影响,甚至充当变革的先导。作为 19 世纪晚期至 20 世纪早期的科学文化的产物,现代医学、无线电、汽油发动机、相对论、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化形式,对社会的影响是至深且巨的,20 年代量子力学的新生,尤其突出地显示了科学的现代性。50 至 60 年代,核子物理和原子能的应用;60 至 70 年代的自动化和控制论;70 至 90 年代,计算机、微电子技术、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推广,所形成的冲击力更是前所未有的了。总之,愈到了后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便愈加迅猛。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同样发生了许多富有时代特点的变化。各种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不断出现;裂变,渗透,整合同样进行,互补性原理成了背后的强有力的支架。整个当代科学,处于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的趋向之中。习惯性思维,正统的观念意识,现成的定律及范式之类,遭到进一步的怀疑和挑战:绝对权威不复存在。封闭是愚蠢的。个体性,差异性,偶然性不容忽视。没有万古长存的事物,因此变革不能停顿。打破现存的秩序,从无序到有序。统一并非操纵,它仅只意味着事物间的某种关联。既有控制,必有反控制,如此才构成了“系统”……普利高津在描述最近 20 多年来自然观发生整体的断裂时,指出:这种断裂绝不可能是某一单独领域造成的结果,而是广泛的现象,产生时带有爆裂声,并且可以扩展。爆裂的声音虽或遥远,微末,隐约可闻;然而它是切实的,所以能够鼓舞心灵,使我们感知未来的震荡。

自从罗马俱乐部的报告问世以后,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问题,还有海洋及空间问题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未来学界,各种极端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论调都出来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已被告知:科学本身潜在着使徒和魔鬼两种力量,而且一直处于冲突之中。当科学技术走向成熟,或者说,当它从掌握自然力量进而左右人类生活时,文明危机便随之发生了。

所谓文明危机,其实是意义危机,价值危机。因此,如何从

事文化主体的精神品格的建设,是横亘在我们与时代之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知识分子是科学文化的发掘者和播种者,是精神文化的体现者和改造者;但同时,又是社会危机和历史责任的一大承担者。

古代的人文学者曾为贵族和教会写作,自然科学家为雇主工作,直至 15 世纪,科学和艺术仍然沦为神学的婢女,我们很难从中窥见人文精神的闪烁的微光。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情况渐渐有了改变。经验科学正步进入信仰的地盘,驱赶其间的迷雾,理性之光使认识升华;虽然后来有着对“非理性”的阐扬,而其实,那是对无视人类更广大的精神领域的专断与僭妄的理性的抗议罢了,结果维护了人性的健全。自近代以降,科学文化不断获取“新工具”,但最重要的莫过于寻找灵魂。知识分子以其创造性劳动服务于人类,在体现自身价值的同时,表达了对社会的关怀。由于知识分子的理性自省能力的增长,人文思想的血脉非但不会中断,二战以后,特别在今天,对于人类,人的本质,人的命运以及未来的关切,几乎成为知识界压倒一切的主题。

今天,我们着手编辑“20 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本意在于通过个人选集的组合方式,显示接连几代知识分子的基本风貌,勾勒出本世纪人文思想发展的大致轮廓。这是初步的素描,尚谈不上严整的巨幅壁画。

前人有“万有文库”,万物皆备于我,可谓懿欤盛哉;但以我们的能力和条件,大抵只好择取一组组断面了。自然,不求完备也未尝不可以算是一种选择。外国近代思想的译介,已经有一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了,可是,多少经典性作家,至今没有他们的译本,甚至连名字也鲜为人知。对于一个文化大国来说,这是很不相称的。庞德说,伟大的文学世纪必然是翻译世纪。广而言之,文化也一样。有鉴于此,当我们做着世纪性的文化总结时,就决意把国内的部分割让出去了。剩下的工作,也就是手头要

做的工作,用鲁迅的话来说,还是叫“盗天火”罢。

作为这样一套大型丛书,本当不限于文化积累的;最根本的目的,仍在于现代文化的重建。当此全球信息一体化的时代,民族文化的发展,必然以世界文化为背景;我们唯有汲取异质性的思想观念,文化知识,人文素养,才能从一个先天的传统的体系内部,创造出有利于保存、发展和完善我们自己的良好的生态环境。

这部“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在上海出版,使我们深怀一种温暖,遥遥缅想那里的创榛辟莽、筚路蓝缕的一代翻译界先驱。在中国现代化的启蒙时期,他们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全国的译书中心——所凝聚,口述笔译,中外参证,推敲译名,另铸新词,掀起了西学东渐史的第一页。

有一部日本思想家撰写的著作《20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于1901年在我国翻译出版。出版后,即遭政府当局查禁。1927年,曹聚仁先生将它重新标点出版,赞叹道:“在25年前,中国学术界已有人来译述这一类读物,真可使我们现在人十分惭愧。”比起时代要求于我们的,我们着实做得太慢了,太少了。

在又一个世纪的钟声即将鸣响的前夕,谨以此书库为人类思想文化生生不息的洪流作涓滴奉献。

1996年7月,广州

编者前言：人的精神拯救

在 20 世纪初俄罗斯精神文化的复兴运动中,尼·亚·别尔嘉耶夫是最具个性魅力的人物之一。他毕生关注人类精神史的发展,在整整半个世纪的著述活动中,他始终不懈地探索着人在现代世界中的命运、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个性和自由的关系等问题。他保存着俄罗斯灵魂特有的爱和悲悯,以人格主义的眼光审视着尘世间的恶、苦难与不幸,并对人和宇宙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上帝与恶魔、信仰与知识、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永恒与时间、存在与虚无、自由与奴役、真理与伪理、文化与文明、自我与非我、毁灭与复活等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在此基础上,别尔嘉耶夫建构了他本人所命名的末世论哲学。他那富含宗教意味的思想对 20 世纪风靡全球的存在主义思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俄罗斯最具世界性影响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是欧洲思想之路由近代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的驿站。

一、小传:意义的探索给出生活的意义

1874 年,别尔嘉耶夫诞生于乌克兰的基辅。他的父亲属于行伍出身的上流贵族。曾祖父和祖父曾是沙皇麾下骁勇善战的将军。父亲也是一名退役的近卫重骑兵军官,在信仰和生活习俗上烙有典型的俄罗斯特征。母亲是一名伯爵的女儿,身上有一半法国血统,从小接受的是法国式教育,她在进行交谈和书写

的时候,法语水平远远高出俄语的水平。她在信仰上尽管属于东正教,但其内心情感却更认同天主教。别尔嘉耶夫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东正教文化和天主教文化相遇和冲突的环境里。此外,如同俄罗斯的许多杰出人物的经历一样,奶妈对未来的哲学家在道德构成上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善良、仁慈的奶妈激发了别尔嘉耶夫对普通人的热爱与同情,帮助他加入了“忏悔的贵族”的行列,铸就了他与人民紧密的联系。

按照贵族的惯例,别尔嘉耶夫在 10 岁上进入基辅武备学校,以便将来成为沙皇的侍从官。但是,出乎家人意料的是,这个军人的后裔在天性上极端厌恶战争和军人,对武备学校学生身上的粗鄙和野蛮深恶痛绝,念到六年级时,他便自动退学了。1894 年,别尔嘉耶夫以校外考生的身份考入基辅的圣弗拉基米尔大学自然学系。一年以后,他转到了法律学系。早在少年时代,别尔嘉耶夫就对哲学产生了兴趣,认定自己负有哲学研究的使命,并且啃读过如《纯粹理性批判》和《逻辑学》那样艰深的著作。大学期间,他更加广泛地阅读哲学著作,进行哲学思考。同时他还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别尔嘉耶夫对马克思终生怀有好感,即便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阵营以后,他依然向往着社会主义)。1898 年,他因参加学生运动而遭到逮捕,并被学校除名。同年,他的一些有关哲学和社会学的评论文字开始出现在报刊上。1901 年^①,他被判流放到沃洛格达省,在那里成为一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探讨俄罗斯的命运和知识分子的使命问题。

1904 年,别尔嘉耶夫来到俄罗斯的文化中心之一彼得堡,参加《新路》杂志的编辑工作。不久以后,他和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创办《生活问题》杂志。他在那里结识了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通过这一对夫妇的介绍,别尔嘉耶夫接触到了聚集在彼得堡的几乎所有的文化精英,与他们共同探讨俄罗斯

① 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卷,应为 1899 年。——编注

的出路问题,探索生活的意义。在别尔嘉耶夫看来,“意义的探索已经给出了生活的意义”。因此,他已决意在俄罗斯的这场精神文化的复兴运动中做一名推动巨石的西绪弗斯。

1909年,别尔嘉耶夫与司徒卢威、弗兰克等人合作出版了一本文集《路标》。文集的作者们对1905年流产的俄国革命进行了严肃而深刻的反思,从各个角度考察了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局限,呼吁人们抛弃激进的乌托邦幻想,致力于精神的新生,在民主社会里重建贵族的理想主义,以消除个性与社会的悲剧性冲突。这部文集在当时反响极大,被认为是“由一些最有才华、最聪明的知识分子写成的一份卓越的文献。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学者阶层反叛’的事件”,“在欧洲整个社会向善的自由主义思想中,几乎没有一个重要论点不曾被这些作家所采用或被他们以惊人的洞察力所预见”。1911年,别尔嘉耶夫出版了《自由哲学》一书。这部著作是他前期哲学探索的一个方向。他有时被人称为“自由哲学家”,其源起就在于他坚持“世界的奥秘就隐藏于自由”,终生都在研究自由的哲学,不断地补充和完善它。在随后完成的《创造的意义》中,别尔嘉耶夫猛烈地抨击自然主义的人类中心论和神正论,阐述了创造的意义,尝试着以个性的体验为依凭去建构人格主义的哲学。在这两部著作中,别尔嘉耶夫精神探索的两大主题已经基本确立。

十月革命以后,别尔嘉耶夫创建了“自由精神文化学院”,在各种研讨班上讲授自己的理论。他一度担任过莫斯科大学历史和哲学系的教授。1918年,论文集《俄罗斯的命运》出版,在知识圈内引起了热烈的反响。1921年,他因涉嫌“策略中心”案而被捕,经捷尔任斯基审讯后,被释放。次年夏天,别尔嘉耶夫再度被捕,并被驱逐出境。从此,他就在流亡的状态中度过了一生。别尔嘉耶夫起初侨居柏林,并在那里创办了宗教哲学学院,结识了德国的文化人类学家舍勒,在相互的交往中各自丰富了自己的思想。1924年,他出版了《新的中世纪》。该书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帮助他跻身于欧洲最主要的哲学家行列。同年,他迁居到巴黎市郊的克拉玛尔。他在这里进入了自己创作

的巅峰状态,撰写了一系列自认为最有意义的著作:《自由精神的哲学》(1927~1928)、《论人的使命》(1931)、《精神与现实》(1937)、《论人的奴役与自由》(1939)、《俄罗斯理念》(1946)、《精神王国和凯撒王国》(1949),以及一部独特的精神自传《自我认知——哲学自传的体验》,等等。除著述以外,他还与当时宗教哲学界的主要人物,包括雅·马利坦、埃·日尔松、埃·穆尼埃、加·马塞尔、卡·巴特等有密切的往来,他的寓所是当时法国的思想中心之一。1947年,英国剑桥大学授予别尔嘉耶夫神学名誉博士学位。此前,在俄罗斯人中间,只有屠格涅夫和柴可夫斯基获得过此项殊荣。同年,他又得到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通知,被提名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

1948年3月23日,别尔嘉耶夫走完了整整74年的人生道路,与世长辞。

二、俄罗斯灵魂的界定

本世纪初,别尔嘉耶夫主要沿循着索洛维约夫走过的“俄罗斯理念”之路,试图为俄罗斯的灵魂给出一个切实的定义,他在《俄罗斯的命运》一书中详尽深入地分析了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征,指出在这些特征背后潜在的生机和危机。在别尔嘉耶夫看来,“俄罗斯的自然地理与精神地理是相适应的”。俄罗斯是世界的东方和西方的交汇处,这个民族既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它同时容纳了西方和东方两种因素,在精神深处有两股势力发生着冲撞和相互作用。在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上生长起来的文化,明显具有一种“二律背反”的特点。一方面,俄罗斯是最无组织、最无秩序的国家。无政府主义在这块土地上拥有天然的温床,人们几乎像害怕瘟疫似的害怕政权,渴求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与此相联系,俄罗斯人企望生活在集体的温暖中,带有较强的阴性特征,被动、驯顺、温和。这就决定了俄罗斯民族的无政府主义又是一种缺乏个性的无政府主义,他们的自由“不是为自己争取自由,而是让人还给自己自由,

一种远离积极性的自由”。另一方面，俄罗斯又是一个最国家化、最官僚化的民族，它能够把任何事物都转化为政治的工具。俄罗斯人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拥有一套庞大的国家机器，俄罗斯人为捍卫它们的存在和维持它们的运转耗尽了他们的创造力，他们在沉重的负荷下失去了个体权利的自觉，不再重视个性的生存。别尔嘉耶夫指出，在俄罗斯，“命题会转变为反命题，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诞生于无政府主义，奴性诞生于自由，极端的民族主义出自超民族主义”。高尚与卑鄙混合在一起，天使的成分与魔鬼的成分混合在一起。

显然，一般的理性无法彻底理解俄罗斯。在俄罗斯文化中蕴含着强烈的非理性因素，它与欧洲传统的理性主义文化截然不同。那是一种狄俄尼索斯式的迷醉元素，它敌视理性，敌视整个文化、整个意识、整个精神性。受着酒神狂欢的驱使，俄罗斯人善于把历史转化为幻想，把现实生活变成与实际不相符合的浪漫小说。别尔嘉耶夫将它称之为“黑葡萄酒”元素。在俄罗斯的文化积淀中，它是一种黑色的、阴郁的、蒙昧的、不透光的自然力。任何人一旦接触了这种迷狂的东西，就不能不沉醉于其间，很难挣脱它所营造的氛围。这种自然力不仅存在于普通的老百姓中间，甚至在一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身上都有流露。对此，陀斯妥耶夫斯基这位残酷的天才在自己的创作中便有着深刻的揭示，并以自己不安的生活印证着它。

与上述非理性因素相联系的是，俄罗斯民族有着强烈的宗教感。一般而言，追求自由的俄罗斯人并不严格地恪守某种宗教教义，奉行某种戒律。但是，在他们的天性中并存着两种因素：狄俄尼索斯式的放纵和东正教的禁欲。蛰伏在这种放纵与禁欲背后的是，俄罗斯人“对另一种生活，另一个世界的向往”。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人民，就自己的类型和灵魂结构而言，是信仰宗教的人民。即使是不信宗教者也仍然有宗教性的忧虑，俄罗斯人的无神论、虚无主义、唯物主义，都带有宗教色彩。俄罗斯人即使离开了东正教，也仍然会寻找神和神的真理，寻找生命的意义”。俄罗斯人大多崇拜精神，倾心于现实以外的存